

内部资料

文史参考资料汇编

· 第5辑 ·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小组编

《小城春秋》作者高云览自传

..... (1)

冯玉祥生平事略

.....徐景星 陶家屿 刘炎臣 (6)

订正·补充·讨论

..... (51)

王 ~

250.6

38
2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K250.6
88
2

1954.10.7

订正·补充·讨论

关于“黑炮台”遗址的考证·····	常家骥	(51)
袁世凯墓名考·····	李建武	(51)
段祺瑞与奉系的勾结·····	潘 荣	(52)
北洋军阀事迹补充·····	张澜生	(52)
关于世界语运动史料的补充·····	奈 西	(53)
给劳荣同志的信·····	蒋齐生	(53)



087.32

《小城春秋》作者高云览自传

按：这是高云览同志在一九五一年秋写的自传。原题《我的自传》，署名高友庆（又名高云览）。现在的题目，是我们改拟的。个别词句略有改动。原件存民盟天津市委员会。

我十三岁时就爱文学，一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它。文学是政治的武器。为着磨利这武器，有一个时期我钻入社会科学的研讨。我的文学生活和政治生活是互相联结着走的。

二十多年来，我写了一些东西，散见于报章杂志和单行本，其中包括时评，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戏剧等创作，从里面可以看出一个人思想发展的线索，那线索是连接着中国革命发展的。

直到现在我参加过四个政治团体：

第一次十八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C Y）；

第二次二十三岁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第三次二十九岁参加马来亚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系马来亚的进步组织）；

第四次三十七岁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民盟）；

下面我将极简单的叙述我是怎样走着这些道路的。

我出身于贫苦的家庭，父亲是没落的小商人，我读小学时就交不起学费，读中学时靠一点可怜的稿费来维持自己。

我在十五岁时，郁达夫的颓废作品对我有极坏的影响。我学人家颓废，我年轻生活已带感伤主义的色彩。十六岁时读着郭沫若的“文学家的觉悟”，顿觉振作不少。郭沫若参加北伐，投笔从戎，给我个好的提示。从那时起，我热爱郭沫若的作品。

一九二七年十八岁，我在上海泉漳中学读书时，我开始加入“C Y”。记得那时是教师李鼎新先生（平心）介绍我加入的。我觉得很兴奋，同时又觉得骄傲。我生吞活剥地钻读一些党给我的指导书籍，我又吸收新团员入团，我开始在学校活动起来。

一九二八年初，我因父亲逝世返乡（厦门），任“厦门商报”副刊编辑。我开始写“短评”嘲骂属于国民党治下的一切施政。那时适逢蒋宋结婚，我又写文抨击他。终于为当局所忌，六月间，我由厦门流亡到漳州，不久我又任“漳潮日报”编辑。那时，我立论偏激，攻击一切，犯着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我满脑子教条和公式，凡不合教条和公式的，我必反对之。我强调城市暴动的必要，写了一些其实是幼稚的“普罗”作品，人家也以“普罗”作家视我，而我也自命不凡。老实说，那时候我的理论基础是十分有

限的，而我竟那样自信的写起指导论文，现在想来真是觉得可笑。

那时候，我把“文化批判”捧为指导理论。我钻研朱镜我、彭康、李初梨、李铁声等人的论文，内心十分响往他们。那个时期，他们正联合着“太阳社”的钱杏邨（阿英）批评鲁迅，其实这样的做法是犯着很大错误的。而我竟站在“文化批判”这一边，我在“漳潮日报”也跟着批评起鲁迅来，当时不自觉错误，现在检讨起来，才觉得那时实在是太狂妄也太幼稚了。

总结我这时期的错误，是犯了左倾幼稚病、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

一九三〇年初，党仍派人来和我联系。到厦门白色恐怖猖獗时，我又流亡到同安的马巷，这时，我和党的联系无形中脱节了。我藏身从事埋头写作。我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前夜》。一九三二年我把《前夜》寄给《北斗》杂志（丁玲主编），适丁玲被捕，《北斗》也被封，《北斗》的另一编者便将《前夜》交潮风书局出版为单行本，笔名为高健尼。一九三二年这年约在十月间，我经杨骚同志的介绍，加入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左联）。那时经常开会联络的是叶以群、穆木天、杨骚、白薇、蒲风（已故）等同志，我在上海公时中学任国文和社会科学教师。

一九三三年春我返厦门，妻患产褥热病歿，遗下一女名迅萤（现已长大参加军干，系青年团员）。这时我贫病交加，凄惨度日，镇日沽酒买醉，写悼亡诗遗愁。我在十六、十七岁时所传染的那种感伤的情绪，现在又旧症复发。就在这时候，厦门白色恐怖又嚣张起来，蒋匪的特务爪牙到处横行，一些政治上的同志和文化上的朋友有的被捕被杀，有的中途变节卖友求荣。这时我中心哀愤，记得我所写的律诗，内面有这么两句：“痛憎卖友为秦贼，愧疚供身作楚囚”。这很可说明当日的实际情况，和我那时的内心愤慨。

我利用悼亡给我的哀痛和伤感作为我意气消沉的掩护。我这时就在侨南中学和中华中学教书。

虽然过着教书生活，我仍然不忘对“光明”这一面的响往和支持。我经常介绍学生读课外的进步书籍，组织文学研究会，戏剧社，我自己写剧本自己任导演，前后演出的有“夕影”（以反帝反战为主题），“没有太阳的早晨”（反剥削反压迫为主题）及“大岗”等剧。我演出的东西引起厦门戏剧界的注意，同时刺激了新的戏剧运动，我的剧本透露了我的思想立场。鲁迅先生逝世那一年，厦门进步的文化团体举行“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选我为大会的主席。救国会“七君子”入狱时，厦门的救亡运动高涨，我也配合着这运动宣传抗日。一直到“七七”事变发生，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的愿望才实现了。

一九三七年我到新加坡。我在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任教务主任。同时为“南洋商报”经常写稿。那时张楚琨编该报的“狮声”，为当时最有特色的副刊。一九三八年为配合抗日及统一战线工作，我参加马来亚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系进步的抗日团体）。一九三九年，我任“南洋商报”特派记者，由南洋回到战时的重庆；接着，张楚琨任“南洋商报”特派员，也赶到重庆来了。我俩汇合后，即偕往大西南后方和前线视察旅行，沿途发通讯报告。一九四〇年三月间返重庆时，适陈嘉庚先生领导“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也来到重庆，陈氏嘱我和楚琨参加该慰劳团，我们于是又得作大西北的旅

行。经过兰州、青海、宁夏、绥远、洛阳、中条山后，又到西安。这时慰劳团分左右两派，我和楚琨坚持要全团由西安入延安视察，为右派所反对。蒋鼎文这流氓竟公开破坏慰劳团行动，甚不自由，至是沿途要到延安去的计划终于给挡住了。当时内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在西安的期间，特务是经常紧跟着我们的。但我和楚琨还是暗中溜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访问林祖涵同志，他给我们极宝贵的政治情况的材料，我们欢喜极了。

慰劳团回到重庆时，叶剑英同志曾私下好几次约我和楚琨二人去谈话，并设宴招待。那几次的谈话，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嗣后我们又到中共办事处晤周恩来先生，他对马来亚形势和我们的工作问题给予极其宝贵的指示。

到了我们离渝飞港时，特务黄天爵（后为厦门伪市长）也同机跟着来了。他是被派来监视我俩的。我们到香港后晤廖承志同志，同时内定聘请胡愈之同志往新加坡任“南洋商报”主笔。

延安视察后回到南洋的陈嘉庚先生，到处歌颂延安，这使南洋民主运动展开新的一页。而在文化方面，胡愈之是这一运动最好的吹号者和主持者，他使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都团结在他的周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结了婚；不久，新加坡就沦陷了。沦陷前，文化界组织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清晨，我们眼见大势已去，便雇一支破旧的小电船离开新加坡到苏门答腊去。我们一行二十余人，有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汪金丁、王纪元、蔡高岗、张楚琨、沈兹九、邵宗汉等，从此我们便在苏岛的原始森林中过着逃荒生活。

在逃亡期中，我们一行分居各地，我最初住在“巴爷公务”这地方，同时居住的是胡愈之、张楚琨、郁达夫、汪金丁、沈兹九等人。我们建立了秘密小组（郁达夫除外），展开华侨抗日宣传工作，研究印尼问题。同时为着维持生活，我们经营酒和肥皂厂（酒厂以郁达夫任掌柜，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

有一次，我为日本宪兵所捕，日本宪兵看不出我是什么人，把我释放了。我立即再作逃亡计划，我和张楚琨携带彼此的家眷偷雇了一部小汽车，星夜突围而逃。第五天到了“巨港”，我改名就在那里卜居了。张楚琨又搬到“楠榜”去。

从此我在巨港装为商人，并开小型的肥皂厂和酒厂作为掩护。张楚琨也在楠榜干了小工业，运用我们对事业的一点机智，我们干的小手工业竟发达起来。日本投降后，我们把盈利都购置了土产。当时我与楚琨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我们在旧中国黑暗的长夜里都穷困了半生，我们喜欢干的文化事业，都因为“钱”的问题而搁浅，无法发动，今后我们俩应该携手合作，为实现这一个愿望而奋斗。

日本投降后，我们回到新加坡，我们立刻拨款投资组织“新南洋出版社”出版“风下”月刊，由胡愈之任主编。

我和楚琨则合资组织“巨元贸易公司”，同时遍设分公司于巴城、巨港、楠榜、实武牙等地。也正如作战一样，商业上的运筹帷幄，仍然需要智谋的。我们深入印尼内地运胡椒来新加坡，不久我们胡椒的入口数成为全马来亚第一位，橡胶入口数成为第三

位。我在商业上打了几场胜仗，很快就（发）展成一个“好局”来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蒋介石彻底撕毁了停战令和政协决议，海外的党棍特务，也鼓噪喧嚣，针对着陈嘉庚为目标大肆攻击。这时新加坡可以代表新民主力量的报纸，连一份都没有。短视的华侨资本家没有一个肯掏腰包创办报纸，因为明知这是亏本生意。海外侨众，“左”“右”两派的对立，也随着祖国国共形势的紧张而更形尖锐起来。这时，建立一个可以属于我们自己的民主力量的报纸，是绝对必要的。

于是，“南侨日报”便应时而生了。

“南侨日报”以陈嘉庚为董事长，胡愈之为社长，张楚琨为总经理。当初发起时，则由楚琨奔走鼓吹，我则从旁推动，并先投巨资作为提倡。“南侨日报”出版的前夕，我们整夜没睡，内心欢呼着，一直到天明。看第一份报纸发出去，太阳出来时，我们睡着了。多么快乐呀！我们的愿望实现了。为文化事业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愿望实现了。

“南侨日报”对外虽然宣称是无党派的，其实，它可以说是海外民盟的机关报。

随着国际形势对立的尖锐化，英帝国主义对于“南侨日报”的存在感觉着害怕了，终于在一九五〇年被封闭。报社里的工作人员被逮捕了好几个。这里不再另述了。

我和楚琨创立商业机构的时候，我曾和他暗约。我说：“我们既为同一的政治理想而奋斗，那么，我们就需要警惕。英帝是反动的，奸险的。我们要随时准备它的下毒手。殖民地吃人的政策，我们是了解的，为着应付英帝，我们需要机警。凡是对外的，你去；对内的，我来。你上台演唱，我幕后工作，一切应当出名露面的都是你，我不要出面。你已经“红”出面了，就索性“红”下去，横竖英帝迟早总要让你出去的。”

从此以后，我从不用真名发表文字，我也从不在公开场合登台演讲。我既扮作商人的角色，我就应当扮得象样。所以，我在一九四六年加入民盟后，翌年我便决定不再参加公开活动了。

英帝在一九四八年宣布紧急法令，大批的文化工作者和革命工作者，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被放逐出境的出境。一九四九年春，楚琨为着回避这逆潮到香港来了。

两个月后，我被英帝的“政治部”逮捕了。理由是高友庆担保一个香港贸易公司的中共人员入境（这事倒是实在的），说我“通共”。

新加坡的党报和准党报便造谣生事的发表新闻，说我是“中共党员”，一些反动的侨领和党棍便向“政治部”秘密人呈，说我的“巨元公司”是属于中共的机构。

我被捕两个月，终于被放逐出境。我搬到香港来住，张楚琨也不能再返新加坡了。

七月间我到日本去，作商业性的视察和旅行。约一个月始返。

我们除经营进出口贸易外，还经营轮船公司。我们在新加坡时购置两艘轮船，一名南美（一千四百吨），一名南元（四百吨，系登陆艇，已售中国海军部），过去在新加坡航行苏岛，颇获利。

我在未被捕以前的一九四八年底，曾由新飞港晤潘汉年（饶彰风介绍），他鼓励我将“南美”“南元”二轮开返新中国服务，为华侨投效先倡。我立刻答应他。时上海青岛尚未解放，已解放地区急切需要运输物资。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即放弃南洋航线的利益，将“南美”“南元”开返祖国一直到现在。这两艘轮船虽系英籍，挂英旗（这是为

航行的便利)，但她们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她们也将永远为祖国服务，永远永远不回去了。

一九五一年春，我在天津设立“巨兴行有限公司”，经营南北土产及进出口贸易。

我到天津，是在一九五〇年二月。

经过黑暗长夜，经过摸索和战斗，突然看到新中国的黎明，还有甚么比这更欢喜的吗？这是梦吗？不，这是现实。

我把家也搬到天津来了。在海外十多年，蒋匪帮气焰猖獗时，差不多是有家归未得，现在我是回到我真正的家——祖国来了。

当我第一次被我的船员称做“资方”，第一次被列为民族资产阶级时，我非常不舒服，我甚至起了憎恶的感觉。随后我想今日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它一定的历史任务需要完成时，有它的桥梁作用，我的心才比较平静一点。

但我仍然不愿做一个工商界人，我对业务的经营渐渐不热心，明知这是不对的，但总提不起劲。我有个想望：我应当做一个脑力劳动者。我不过是因“历史的安排”在海外客串了“资产阶级”这个角色，做了个临时演员，现在我应当复员了。我曾经是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一、二十年来，以“同路人”的心情，响往工人阶级的政党，直接间接的把工作献给了她。现在回到祖国来，我变成了工人阶级的“资方”，这怎么不叫我内心“矛盾”呢？

从毛主席发出来的光，把我的弱点照出来了。我的小资产阶级自高自大的思想，自由主义的倾向，都显露出来了。我平日里不自觉的，而且很自信；现在我才觉得我的自信，也就是自高自大的表现。我的包袱，不健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包袱，太多了。我应当依靠群众，依靠组织，依靠政府，作思想改造，而且需要长期改造。我最近读了一些共产党员的文艺工作者检讨自己的文章，内心很受感动。他们批评自己是那样彻底，那样坚定，毫不保留！这是伟大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古人所谓“知过必改”不过是几千年历史上的一句空话，真正能够做到的是今天的共产党员！他们那样深刻地挖自己的根，更使我觉得自己思想改造的重要。

馮玉祥生平事略

前 言

在中国近代史中，馮玉祥是一个重要人物。国内外有不少人写过他的传记，他自己也写过《自传》（未刊）和《我的生活》等；还有几厚册《日记》。过去对馮玉祥的评价历来是毁誉褒贬莫衷一是，往往不能实事求是地刻划这个人物的真实面貌。解放后国内还没有出版过一本馮玉祥传记。本文目的在于为撰写馮玉祥传记提供一部份经过整理选择的简明资料。按照馮玉祥一生中的重大转折，重要问题，突出特点，纵横兼顾，分题整理。

原稿是1976—1977年由閻家屿、刘炎臣、徐景星集体研究，分别执笔。其中第一、二、五、十章，刘炎臣执笔；八、九两章，閻家屿执笔；三、四、六、七、十一章，徐景星执笔。1979年、1980年，全篇又经徐景星两次补充修改。原稿参阅了天津市政协所存文史资料未刊稿，并得到政协文史办公室诸同志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

目 录

一、行伍出身的北洋军官.....	(9)
①在穷困中成长.....	(9)
②勤学苦练 逐步升迁.....	(9)
二、反对封建帝制 拥护民主革命.....	(11)
①由忠君到反清 发动滦州起义.....	(11)
②坚决反对复辟 清除复辟祸根.....	(12)
③敬仰孙中山 拥护民主革命.....	(13)
三、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14)
①一贯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14)
②严正对待帝国主义分子 维护国家尊严.....	(15)
③反帝主张的发展.....	(17)
四、对基督教的信仰、利用与摆脱.....	(18)
①信教的经过和对基督教的认识.....	(18)
②把基督教义作为军队精神教育的内容.....	(18)
③利用基督教关系进行政治活动.....	(19)
④对基督教认识的转变.....	(20)
五、发动北京政变 推翻曹吴政权.....	(21)
①革命形势推动下的“倒戈”.....	(21)
②不战而胜——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23)
③政治上的失败.....	(24)
六、五原誓师走向革命道路.....	(26)
①内外反动派联合围攻下国民军撤退.....	(26)
②五原誓师改变了国民军的性质.....	(27)
③部队大量扩充 弱点逐渐暴露.....	(29)

七、清共拥蒋背叛革命 导致西北军瓦解·····	(30)
①在革命运动冲击下由联共转为反共·····	(30)
②北伐战事结束 蒋介石削减西北军·····	(31)
③阎冯联合发动中原大战的失败与西北军的瓦解·····	(32)
八、严格的训练与严明的纪律·····	(34)
①全面严格的基本训练·····	(34)
②具有鲜明特色的练兵方法·····	(35)
③关心与笼络 惩罚与纵容·····	(36)
九、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冯玉祥指挥作战的特点·····	(38)
①从长期战争实践总结出来的原则·····	(38)
②高昂的士气压倒敌人·····	(39)
③出其不意的侧后袭击·····	(40)
④优待俘虏的政策·····	(40)
⑤在退却中失败·····	(41)
十、独特的性格和作风·····	(42)
①嫉恶如仇·····	(42)
②爱护人民群众·····	(43)
③提倡勤俭 主张实干·····	(43)
十一、抗日反蒋 为和平民主而奋斗·····	(45)
①察北抗日与泰山读书·····	(45)
②呼吁停止内战 要求实行抗日·····	(46)
③苦闷中度过的抗战八年·····	(47)
④在黎明前死去·····	(48)

一、行伍出身的北洋军官

在穷困中成长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西北乡竹柯村。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在直隶（河北）青县兴济镇。^①

冯玉祥的父亲原名秀文，改名有茂，字毓亭，亦书郁亭。年青时作泥瓦工，还当过雇工。经常到各处流动谋生，一直很穷困。冯有茂身材高大，爱好武术。他给一群学武术的少爷们当差役，自己也跟着练武。到考试的时候，那些少爷们全没考上，他这个差役反倒考中了武秀才。以后他投入刘铭传的铭军当兵，随军到西北各地镇压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后来调回山东、直隶一带屯垦。

冯有茂在山东济宁驻防时结了婚，并在那里生了冯玉祥的长兄基道。以后移驻兴济镇，又生了冯玉祥。不久，冯有茂到保定练军后营任右哨哨官，全家迁到保定府城东二里的康格庄。那时冯玉祥只有三岁，这里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说话是保定口音。

幼年的冯玉祥，家里生活穷苦。在他七八岁的时候，经常同他哥哥到野地里拔草拾柴。他自己回忆，幼时很少穿过新鞋，大都是哥哥穿过的鞋，经过缝补以后再给他穿，叫做“二鞋”。他父亲的薪饷是月底才能发放，冯玉祥经常要去当铺当当和赎当。当铺掌柜那一付冰冷的面孔在冯玉祥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创痕。

一八九二年，冯玉祥十一岁，他的母亲死去。转年，经他父亲的好友，哨长苗开泰的保荐，他在保定练军里补了一个名字，吃一份“恩饷”（每月三两六钱）。到一八九六年，冯玉祥十五岁时就正式入伍当兵了。

冯玉祥说：“我在童年时期，一直在穷困中挣扎着”。穷困的家世给他“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

勤学苦练 逐步升迁

冯玉祥在家里只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私塾。入伍以后，自己勤奋自学。他买不起纸笔，用一根细竹管，扎上一束麻，蘸着稀薄的黄泥浆，在洋铁片上练习写字。后来又改在一块方砖上练字。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转入武卫右军三营当兵，时年二十一岁。九月，开驻天津韩柳墅。他从随军的民佚中找到一个山东人胡源长，给他讲《论语》、《孟子》。他还搜集了武卫左军编的操法、阵法以及新建陆军编的几种兵书，夜

^①本章主要根据冯玉祥：《我的生活》和《冯玉祥日记》。为核对一部份具体年月、时间、人物、职务，参考了施文文：《冯玉祥传》。

里就着灯前读。由于他的文化基础太差，十句不过懂得二、三句，只好各处找人求教。

营房是在地上打草铺。他买了一只木箱当桌子，操课以后，就坐在草铺上埋头读书写字。

他说：“我就是念书念死了也好，免得变成一个庸碌无知的废物，消耗世界上的粮食，一点事也不能做”。当时他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出人头地”。

一九〇五年驻在北京南苑的时候，冯玉祥买了一本《纲鉴易知录》，自己又背诵《古文释义》百余篇，这以后才能看懂一般的书籍。冯玉祥说：“这是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这个时期他浏览了很多的书，特别佩服曾国藩、胡林翼这些人。自己还参照曾、胡语录编了一本《士兵教范》，当作训练士兵的教材。

一九一〇年他去山东参观第五镇校阅，路过天津，在商务印书馆买到一批少年丛书，其中包括彼得大帝、哥伦布、富兰克林、林肯、纳尔逊以及班超、司马光等人的传记，内容通俗易懂，他如获至宝。第二天坐在去济南的轿车上，任凭车子怎样颠动，他一直手不释卷地看着。从这些书里他“增长许多的见识，引起了无穷的感想”。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勤奋读书的同时，冯玉祥对于军事技术也是刻苦锻炼。

旧军队中每哨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代替官长喊操，薪饷较一般士兵高一倍。冯玉祥在保定当兵不久，就苦练喊操的本领，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跑到东大操场放大喉咙喊口令，坚持了四年，从未间断。虽然遭到同营目兵的讥笑，他却终于练出了好功夫。一九〇一年，练军改编准军，冯隶属吕本元的元字前营，拔充右哨教习。他不但能喊一哨操，而且能喊全队的操。

在武卫右军当兵时期，冯玉祥又注意学习野外操练的阵法、战法，他把每天的课和官长的讲解，回来都作笔记，自己进行研究。

由于勤学苦练，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升头棚副目，一九〇三年四月升四棚正目。每次考试学科和操法都是第一，保了一个六品军功。这一年年底，经过考试，升为左哨哨长。一九〇五年三月，武卫右军改编为第六镇，冯调升三营司务长，又升排长。八月，二营后队队官出缺，召集各排长考选，冯玉祥考第一名，升了队官。一九一〇年由陈宦考升冯玉祥为第二镇八十标第三营管带。

旧军队的军官升迁多是依靠各种封建关系的提携，以及贿赂拉拢，冯玉祥则全凭自己勤学苦练，通过考试，步步升迁。这种情况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冯玉祥可以算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北洋军官的典型。

二、反对封建帝制 拥护民主革命

由忠君到反清 发动滦州起义

冯玉祥幼年学习孔孟之道，接受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观念，忠君思想很浓厚。一九〇一年被外国侵略军赶出北京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从陕西返回北京，途经保定时，冯玉祥奉派参加警戒护卫的“卡轮”营，担任清扫道路的工作。他怀着极大的虔诚，手里拿着红漆柳条小簸箩，向道路上洒水，为“两宫”净街。一九〇八年，当他听到慈禧和光绪相继死去的消息，竟至痛哭了好几天。有人在这期间剃了头发，不遵守为皇上服丧的规矩，他就大骂这些人不忠。

但是，清朝统治的腐败昏庸，外交失利，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逐渐使年青的冯玉祥感到愤慨和失望。

一九一〇年，冯任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这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影响到全国。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孙谏声来到二十镇工兵营充排长，暗中联络青年官兵，进行革命宣传。有一次，冯玉祥和孙一起去山东参观第五镇会操，在路途上孙给他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冯玉祥看了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他“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睛来就看见那些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矢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心里的大山象新加了几个喷火口，血液被燃烧得沸腾，不可遏止”。①

一九一一年二月，张绍曾继陈宦为二十镇统制。张是日本留学生，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二十镇的革命活动有了开展。冯玉祥和七十九标二营管带王金铭、一营管带施从云等组成“武学研究会”，传播革命思想。当时参加的有八十标二营管带郑金声、一营管带王石清、刘一清、兰天蔚、第三镇上校参谋孙岳，以及孙谏声、戴锡九、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韩复榘等。冯玉祥被推为会长。在他的家里用油印机印传单，把南方各省革命活动及民军胜利的消息，摘录翻印秘密散发。“武学研究会”的组织发展很快，又以同乡会、同学会等形式建立各种外围组织，广泛联络官兵，积蓄革命力量。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八月，二十镇七十九标的施从云、王金铭两营调往滦州参加秋操。冯玉祥留守新民府，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被标统范国璋发觉，调冯到海洋镇，加以防范。

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孙中山密派白雅雨北来与冯等联络，密谋起义。推王金铭为北方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长。但由于王怀庆和张建功两人的贩卖，

①冯玉祥：《我的生活》

起义失败。十一月十六日王金铭、施从云、孙谦声等人惨死。冯玉祥在海阳被拘捕，因没有参加实际活动，又有陆建章担保，开去官职，押送保定原籍。^①

坚决反对复辟 清除复辟祸根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袁世凯窃取了政权，由临时大总统而正式大总统，并积极准备作皇帝。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派他的心腹陈宦任四川督军，陈宦调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随他入川。^②这一年的十二月，全国少将以上将领准备联名通电，拥戴袁世凯作皇帝。电稿送请冯玉祥签名，冯非常气愤，当即表示“情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并集合本部官兵伙夫等讲话，表示坚决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随即发出拒绝签名的通电。几天以后，由王士珍领衔发出的劝进电报上，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将领都列名，独缺冯玉祥一个人。

袁世凯复辟帝制，封赏百官，为了笼络冯玉祥，封他为男爵。冯为此抱头痛哭，认为“这是对我冯玉祥极大的侮辱。不把袁贼铲除，不把帝制推翻，对不起滦州起义的弟兄们”。^③他的部队奉令开到前线与反袁的护国军作战，他却与护国军暗中联系，把自己的十六混成旅改为护国军第五师，并迫使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加入反袁的阵营，给袁世凯以严重的打击。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当时冯玉祥已被段祺瑞免去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给他一个直南巡防营第六路统领的空头衔。^④他正在京西天台山“休养”，听到复辟消息，便立即赶回廊坊十六混成旅驻地。卖掉自己房产，得款五千元给官兵发饷。^⑤七月六日，发出声讨张勋的通电。他说：“洪宪打倒不过一年，现在又演出复辟的丑剧，多少先烈拼却头颅，热血，难道都是白费的吗？我深切感到革命不能彻底的毒害”。^⑥

段祺瑞表面打着“讨逆”的旗号，暗中指使段芝贵出面进行“调停”。冯玉祥对此极为气愤，发出通电说：“张勋叛国，罪大恶极，同人等大张挞伐，志在铲除帝制祸根”，“竟有人出而调停，闻悉之余，不胜骇异”。坚决表示“非杀张勋不足以谢国人”。^⑦并立即乘夜率部由丰台出发，直捣北京。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玉祥表示“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去”。^⑧七月十四日冯玉祥发出通电，主张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停发每年四百万两的优待金；取消宣统名义，驱逐出宫；把宫殿朝房和北京内外的王室公地园府收

① 郭泽之：《陆建章与冯玉祥的关系》（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② 第十六混成旅于民国三年（1914）秋改编。当时共有步兵两团，炮兵一营，骑兵一营，机枪一连，每营300余人，全旅兵力五、六千人。（简文义：《冯玉祥传》第五章）

③④⑤⑥⑦ 冯玉祥：《我的生活》

④ 冯调离十六混成旅时，全体官兵哭别。送行时，众人牵冯衣，裂其马褂，每人存一小块，以为纪念。（简文义：《冯玉祥传》第五章）

⑤ 冯玉祥大事年志（高兴亚：《国民革命军史》附录）

归国有；严惩张勋及参与复辟的叛逆……等。段祺瑞收到此电，批：“胡闹多事”。①段祺瑞和各省军阀头目本来都是这次复辟的参预者或附和者，复辟失败后，他们纷纷出来替清王室说好话，替张勋求情，冯玉祥的严正主张完全无人理睬。

敬仰孙中山 拥护民主革命

冯玉祥是北洋嫡系的一个高级将领，孙中山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南方革命党领袖，他们本来是处于互相对立的两个营垒，但冯玉祥一直对孙中山十分敬仰。

一九二〇年八月，冯玉祥率十六混成旅从常德开到汉口，驻在谋家矶造纸厂。当时段祺瑞操纵北京政权，扣发冯军的饷项，冯的处境十分困难。九月，孙中山派徐谦和钮永建带着他的信到汉口去看冯玉祥，对冯说了许多勉励鼓舞的话，希望他能一道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十分感激，对着孙中山的代表，他把“多年的积愆和处境尽情倾吐一番”。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去广东看望孙中山，表示“只要用的着我时，无不尽力以赴”。孙中山又派孔祥熙携带他手书的《建国大纲》访晤冯玉祥，征求他的意见。以后继续派徐谦、王正廷、马伯援为代表，经常与冯联络。所以，冯玉祥后来曾表示：“最使我感激永不能忘怀的是，孙先生瞧得起我”。②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因为冯玉祥在北洋军阀中被看作一个“怪物”，只是利用他能打仗，作为工具。那些政客、绅士认为冯是行伍出身，行为粗鲁，都看不起他。孙中山对他的这种态度，自然使他万分感动。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成功，立即派马伯援携带他的亲笔信去广东，迎请孙中山北上。冯玉祥嘱咐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③

孙中山逝世后，冯玉祥悲痛落泪。他对周围的人们说：“我总觉得我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站在一起，从他的启示和鼓勵中，使我受到了极大的益处”。

①简又文：《冯玉祥传》第五章

②冯玉祥：《我的生活》

③鹿钟麟：《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三、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贯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冯玉祥一贯反对帝国主义，他的反帝思想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最初只是一种简单的排外思想。一九一三年，冯玉祥十二岁，刚在保定补了兵，因为身材高大，有时参加操练。一天奉命出去“轰瘟神”^①，列队走过保定府北门，看到路东有一座外国人传教的福音堂，十分厌恶，就托枪向着福音堂的匾额开了几枪，打得匾上黑了一大块，“心里觉得很痛快，背起枪来，回头就走”。中国人民经过两次鸦片战争，遭受外国的侵略和蹂躏，产生了仇恨外国人的心理。冯玉祥的幼稚行动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一九一四年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冯玉祥和他父亲随保定五营练军开到大沽炮台，修筑工事。日本军舰开进大沽口二十里外拦沙岗地方，舰上的炮口对着炮台。他对日本人特别痛恨，他说：“我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人夺了去！”那时，他只有十三岁。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入内地，冯玉祥从保定府跑出来，亲眼见到日本兵拿中国同胞当靶子射击取乐，他说：“我恨不能一刀砍死他们，以发泄我胸中的激愤”。

一九〇二年二月，冯玉祥投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当兵时，随着袁的总督衙门移防天津。队伍开到距天津二、三十里时，外国人出面干涉，不许再进。冯玉祥随部队撤到杨柳青，又转往独流。冯玉祥事后回忆说：“这是我亲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与刺激”。^②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成立，陆建章编练备补军，冯玉祥担任左路备补军前营营长，到景县地区去招兵。乘火车路过杨村时，英国兵上车盘查，以冯玉祥携带枪支为借口，气势汹汹地禁阻通过。冯玉祥气得“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为什么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英国人凭什么在中国境内这样横行霸道？”^③

一九一五年，冯玉祥驻在陕南时，听到日本向我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感到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心情非常激动，“无论怎样也平抑不下去，甚至几天连饭也不能下咽”。^④

一九二三年，冯玉祥驻北京南苑时，经常对官兵讲述印度、高丽亡国的惨痛情景，激发官兵的爱国意志。在部队驻地的墙上，刷上白粉，大书“誓死救国”，“勿忘国耻”等标语，并在墙上画一大幅国耻地图，标明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丧失国土的情况。有时他指着这幅地图向官兵提问：某某地方是被哪个帝国主义侵略的？

在西北军各连队规定吃饭前要唱“吃饭歌”，歌词是：

^①当时缺乏科学知识，瘟疫流行的时候，认为开炮放炮可以赶走瘟神。

^{②③④} 冯玉祥：《我的生活》

“这些饭食，人民供给，
我们应该，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国民之敌，
复仇雪耻，我辈天职。”^①

以后每逢“五七”国耻纪念日这一天，冯玉祥总要集合部队，讲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妄想灭亡我国的罪行。会后聚餐，吃的是玉米面窝头，上面印着“雪耻救国”四个红字。并在部队营门扎松枝牌坊，中间大书“国耻纪念万不可忘”，左右两边抄录二十一条全文。并集合全军唱国歌，对国旗行敬礼，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并放大炮十余响，用以“震醒醉生梦死的国人”。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九日，日本从俄国人手中夺去的旅顺、大连租借期已满，应当交还，但日本拒不交还。全国掀起了收回旅大的运动。冯玉祥非常气愤，向部队讲话时揭露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并号召官兵：“爱国军人应脱去臭皮囊，以鲜血溅之！”^②

这一年，几个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酝酿要共管中国的铁路。当时的外交部长顾维钧问冯玉祥的意见，冯表示：“请对外人言之，共管铁路，我冯玉祥绝对反对”。^③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阻挠北伐战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冯玉祥无比气愤，到处集合向官兵宣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编了“五三国耻歌”，印发各部以习唱。

严正对待帝国主义分子 维护国家尊严

一九一八年，冯玉祥任湘西镇守使，驻在常德。

在南北军阀连年战乱中，常德是个经常受到战争骚扰的地方。当地的商铺士绅，为了避免溃兵抢掠，竟然要求停泊在那里的日本兵舰加以保护。日本兵舰在街道上张贴布告，有些商铺悬挂日本国旗。冯玉祥召集商民开会，说明托庇外国人是可耻的，并且损害了国家的主权。限令当晚把街面上的日本国旗一律取消，并召见日本兵舰舰长菊田，限令即刻撕毁布告，不准再有这种侵犯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有一天，停泊在沅江中的日本兵舰的几个水兵上岸进城，经过城门时不接受检查，其中一个士兵还蛮横地打了守城士兵一巴掌，士兵们奋起用刺刀与他们搏斗，将他们击退，三名日本水兵受伤。当地日本居留民团团长高桥新二和日本兵舰舰长跑来见冯玉祥，无理取闹，提出要用日本军法惩处中国士兵。冯玉祥非常气愤，立即抬起脚来，脱下一只鞋，要用鞋底打那个日本舰长的嘴巴。并对他们说：“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结果这两日本人自讨无趣，灰溜溜地走了。^④

冯军士兵有时抓到夜间偷越城墙的日本浪人，抓到贩卖烟土的日本人，都依法惩

①傅二虎：《西北军内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②③④：冯玉祥：《我的生活》